



王佐良文集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王佐良文集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佐良文集/王佐良著.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6.
12

ISBN 7-5600-1119-5

I. 王… II. 王… III. 王佐良-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5979 号

王佐良文集

王佐良 著

* *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三环北路 19 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26.75 印张 677 千字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1—4000 册

* * *

ISBN 7-5600-1119-5

H·608

定价: 32.90 元

序

李赋宁

佐良同志离开我们已将近一周年。英语界和外国文学界的同仁,无论男女老少,莫不为他遽然仙逝感到哀悼和震惊。作为他的大学同班同学和几十年的老友,我更觉悲伤和惆怅。

佐良夫人徐序大姐根据佐良生前的喜爱,从佐良硕果累累的著作和作品中精选出数十篇,亲手抄写誉清,交付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准备出版。我想这该是我们对佐良同志的最好纪念。

我和佐良同志相识已是60年前的事了。当时故都北平已处在国防最前线,冀东已成立了伪政权,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不断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平津随时都有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的危险。我们于1935年秋季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那年冬天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我们受了这场爱国运动

的洗礼,开始认识到青年人要为救国救民发奋读书,佐良毕业于武昌文华中学,他的中文和英文程度已是全班之冠。当时清华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课程都是按入学考试成绩分班的。佐良分在大一国文A组,由俞平伯先生讲授;还分在大一英文A组,由英国人吴可读(Pollard-Urquhart)先生讲授。佐良不仅勤奋,还善于学习,他利用课内和课外每一个机会来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见解和表达能力。例如,在完成大一西洋通史课外阅读时,他从刘崇铤先生所指定的耶鲁大学国际著名古代史教授罗斯托夫采夫(Rostovtzeff)所著《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一书里既学到分析历史发展的各种原因(包括心理因素),又开始注意到学术著作的英文文体。又例如,在完成大二西洋哲学史课程贺麟先生所指定的西洋哲

学名著选读和读书报告写作时，他选了柏拉图的《对话录》，用的是著名的周伊特(Jowett)英译本，并且主动用英文写读书报告，受到贺先生的高度称赞。佐良在大二上学期曾参加全校英语演说比赛。他参赛的题目是“*Literature Sweetens Life*”(文学能使生活美好)。他获得第一名，受到外文系系主任王文显先生的称赞，说他能唤起听众的各种感情，很有说服力。佐良对文学的热爱是由来已久的。在大大一下学期，有一次他和我打网球后谈到他的家长要他转学经济，他很犹豫。我极力劝阻他不要转系。幸亏他后来打消了转系的念头。他爱好文学阅读的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在大二时，美国历史小说《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刚刚出版。佐良向陈福田先生借到此书，如获至宝，废寝忘食把全书从头到尾看完，此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佐良的英文写作才能在陈福田先生讲授的大二英文班上已充分显示出来。陈先生要求我们每周写两篇英文作文，堂上

一篇，堂下一篇。他认真批阅，及时发还，真正调动了学生用英文创作的积极性。几乎每次作文都是佐良写得最好。陈先生说佐良能用日常英语词汇写得生动活泼，既叙事，又抒情，给人以新鲜感觉。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北平和天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合作，先迁长沙，后去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在长沙临时大学期间，文学院各系在南岳衡山山麓上课。我们当时是大三学生，有幸遇上英国诗人兼批评家威廉·燕卜苏(William Empson)先生教我们莎士比亚课和大三、大四英语课。燕先生当时只有31岁，未婚，一心扑在教学上。他每周要求我们写英文作文一篇，批改得很详细，并且加上他的精辟评语。他还要求学生用英文写评论莎剧中人物和情节的小作文。燕先生的严格要求——他要求言之有物，观点鲜明，砍掉空洞、华丽的词藻——我猜想燕先生的诗人气质和学人的洞察力都曾对佐良的智力成长和发展起了有益的促进作用。当我们3年级下学

期在云南蒙自上叶公超先生讲授的18世纪英国文学课程时,叶先生居然对佐良的英文写作点头赞赏,而叶先生向来对学生的英文作文是极为挑剔的。我们在昆明上大学4年级时,燕卜苏先生讲授当代英美诗歌。佐良对英诗的浓厚兴趣,他后来对英诗的研究和翻译,以及他自己的诗歌创作,可能都和燕师的启发和教导有关。这里附带提一下受燕师影响的人还有我们同班同学查良铮(笔名穆旦,诗人、翻译家)。我们上大四时,吴宓和叶公超两位先生合开“翻译”课,吴先生指导英译中,叶先生教中译英。佐良和国璋(许国璋同志也和我们同班)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历史系刘崇铉先生曾说他喜欢佐良和我们班其他同学的英文程度好,他主动提出要为我们班开英国史课程。刘先生还介绍了若干部历史名著,指定我们课外阅读。这门课有助于学生获得有关英国历史的全面系统的知识,因此也有可能为佐良后来从事英国文学史的教学、研究与著作打下了坚实、牢靠的基础。另外,我们上大四

时,钱钟书先生刚从欧洲回国,教我们班两门课: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学和当代欧洲小说。钱先生讲课旁征博引,贯通古今,气势磅礴,振聋发聩。他特别重视思想史。这可能对佐良以后的研究也指明了方向。但钱先生同时也重视艺术性。他让学生模仿拉布雷(Rabelais)的语言特点——这是他给学生出的考题之一。佐良的答卷赢得了全班第一,他对拉布雷语言的模仿真是惟妙惟肖!

1939年夏,佐良毕业留校,任西南联大外语系助教。佐良虽然热衷于文学研究、教学和创作,但是他毫无学究气,并不厚古薄今。他了解国际事务,他对实用英语的掌握也是第一流的,受到老师和同学的一致称赞。在这个期间,他翻译了曹禺的《雷雨》为英文。这是他文学翻译的最初尝试,但已显示出他这方面的才华。佐良还和丁则良联合发起人文科学学会,定期举行文学、历史、哲学等学科的学术报告会和讨论会。参加的人除了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外,还特别邀请了一些知名教授和学者

前来指导,例如,闻一多、潘光旦、雷海宗、曾昭伦、吴宓等先生。潘光旦先生为此学会取名“十一学会”,并解释曰:“推十合一谓之士。”意思是说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士)的学会。吴宓先生开玩笑说:“可以叫作‘二良学会’,因为发起人是王佐良和丁则良。”可见佐良早在担任青年教师时期就已积极投身于开展人文科学研究事业,他怀有强烈的学术和文化救国的思想。佐良对于文艺创作素来很向往,对有成就的作家颇为景仰。抗日战争时期有不少位进步作家住在重庆。大约是1943年暑期,佐良、穆旦和我曾在重庆拜访过巴金先生(巴金的夫人上过西南联大,是穆旦的学生)。巴金请我们在新新咖啡馆喝咖啡、谈天。

抗日战争胜利后,佐良考取庚子赔款公费留学,入牛津大学茂登学院,师从 W. P. Wilson 教授,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在名师指导下,佐良完成了硕士论文《约翰·韦伯斯特的文学声誉》(*The Literary Reputation of John Webster*, Institut

für Englische Sprache und Literatur, Universität Salzburg, 1975)。这是一本既严谨,又生动的学术著作,后来由 James Hogg 收集在詹姆士一世时期戏剧研究丛书(*Jacobean Drama Studies*)中,萨尔茨堡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出版。佐良的导师 Wilson 教授是公认的版本学家,佐良在他的影响下对西方目录、版本之学也颇有研究。1961年,周扬同志主持文科教材编写工作,外文组长冯至先生委托佐良制订大学英语专业培养方案中所附中、英文必读和参考书目,佐良所订的书目至今仍然有用。佐良一向重视推荐新书,不断向北京外国语学院提供西文图书信息,和其他同志一起使北外的西文图书馆藏丰富,学术水平甚高,版本也十分讲究。

佐良同志对文学研究的执著和热情是罕见的。他的著作既令人高山仰止,又亲切动人,读者十分爱读。早在50年代中叶,佐良就曾发起创办《西方语文》学术刊物(《外语教学与研究》的前身),刊登学术水平较高的西方文学和语言研究的成果。

60年代初,他约周珏良同志(也是我们的同班同学)和我共同为商务印书馆选编《英美文学活页文选》(后收罗成集为《英国文学名篇选注》,主编为我们三人和刘承沛教授。商务,1983年第一版)。我们企图努力做到通过对英文原文的准确理解和对原作语言结构和文体特色的分析来达到文学欣赏和文学研究的目的。这条原则是佐良同志始终坚持的。我认为这条原则对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外国语言和文学的教学,对端正学风,提倡踏实读书、细密思考,都起了良好的影响。

佐良同志在外国文学研究方面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在于对英国文学史(包括诗史、散文史、小说史、戏剧史等)的研究和撰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分卷中“英国文学”这个长条目就出自佐良同志的手笔。他的几部力作是:《英国诗史》、《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英国散文的流变》、《莎士比亚绪论》等。

他主持的国家重点社科研究项目——五卷本的《英国文学史》凝聚了他最后的心血。他为已出版的《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出版)所写的“序”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模式这个重要问题。他主张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写文学史,要用叙述体来写,要写得生动、具体,要有文采,但要准确无误,符合历史事实和真相,同时还要简练。佐良同志提出的这些原则对今后我国编写外国文学史也会产生良好的影响。

这个文集精选了佐良同志各方面的代表作,包括文学史论、诗论、文学评论、书评、翻译理论和评论、比较文学评论、随笔和序文,以及诗歌创作等,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佐良同志是一位多面手,他颇似柯尔律治称莎士比亚为“万脑人”(myriad-minded)那样博学和多才多艺。佐良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王佐良的生平和他的事业

浙江省历来是中国人才辈出的地方,1916年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的王佐良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从上中学时起,他即对英语教学和英语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数十年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成为杰出的教育家和翻译家,跻身于国际上最著名的英语文学专家之列。王佐良这个名字已经和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高峰联系在一起了。

王佐良童年时随在一家小公司任职的父亲住在今天的武汉市,小学和中学分别就读于汉口的宁波小学和武昌的文华中学。后者是一所由英美圣公会等基督教派开办的教会学校,除了国文(汉语)以外,该校包括体育在内的几乎所有课程都是用英语教授的,这使他在中学时代就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对外籍教员的教学方法也有了亲身体会。中学毕业时,他原本准备投考大学,不料父亲所在的公司却破产了,他不得不改变主意自谋生路,经过努力考取了湖北省盐务稽查处当了一名3等课员(会计)。一年来省吃俭用,凭借微薄的薪金,他居然也积攒下300元钱,从而得以继续求学。1935年,王佐良考入北平清华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即西南联大)迁往湖南(长沙、南岳)和云南(蒙自、昆明)。

学生时代的王佐良已显露出非凡的文学才华,从中学时起即已开始了写作生涯;先是以“庭晟”、“竹衍”等笔名在武汉一些报纸和《中学生》杂志上发表了《武汉印象记》、《一二·九运动记》等散文,继而在昆明《文聚》月刊上发表了中篇小说《昆明居》,但更多的是写诗。可能是因为主修外文的缘故,他的诗风受西方现代派诗人的影响颇大。早期的诗作除在《清华周刊》、《时与潮文艺》等刊物上发表过之外,闻一多所编《现代诗钞》中亦收其两首。

王佐良在大学1年级时,英文写作也初露头角,2年级时的英文作文成绩常名列全班之冠。受当时在清华任教、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英籍教师燕卜苏的影响,他广泛阅读了大量英文版原著,尤对英国诗歌和诗剧感兴趣,自己也写了一些英文诗,有几首以后曾在伦敦出版的文学杂志《生活与文艺》上刊登。

王佐良在翻译方面的最初尝试开始于1940年在西南联大任助教期间。那时工作很繁重,生活又困难,常常要排队买米,他却仍然能坚持看书、翻译。早期译作有爱尔兰著名作家乔伊斯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曾托人带到桂林准备出版,却不幸遇上日寇飞机轰炸,手稿化为灰烬。后来仅整理出一篇《伊芙林》,1947年载于天津《大公报》的文学副刊上。此间他也开始了学术论著的写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撰写了《诗人与批评家艾里奥特》,曾分章节载于《大公报》和《益世报》上,开创了国内研究英国著名诗人艾略特(今译名)之先河。

1939年,王佐良毕业于抗日战争时期由清华、北大和南开大学合建的西南联合大学,留校任助教,后晋升为讲师。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他除了从事教学工作以外,为生活所迫,还要在外兼职,最多时曾同时干6份工作。和当时中国所有热血青年一样,他也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以其精湛的英语专业知识,协助盟国在中国的军援工作。1944年7月至1945年8月,他曾兼任军委会宣传处昆明办事处主任,为向全世界宣传中国抗战形势、扩大中国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声望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西南联大期间,王佐良结识了当时就读于贵阳医学院的徐序女士,二人于1940年在贵阳结为伉俪。在昆明,他们生有二子一女。

抗战胜利后,王佐良辞去在国际宣传处的兼职,举家随清华大学复员回北平,继续任教。1947年秋,他考取了庚子赔款公费留学,成为英国牛津大学茂登学院的研究生,主修17世纪英国文学,导师是著名的英国文艺复兴学者威尔逊。王佐良充分利用了牛津

大学学者云集、学术空气浓厚和文献资料丰富等有利条件,勤奋努力,广泛涉猎了英国古典与现代文学的方方面面,不仅得以提前一年获得 B. Litt(相当于现在的副博士)学位,也为他日后的英国文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撰写学位论文《约翰·韦伯斯特的文学声誉》时,王佐良按照导师的指点,充分掌握了有关这位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剧作家生平业绩及其作品的丰富材料,包括各种私人抄本、剧本目录以至剧院广告,又详细考证了历代作家、批评家和读者、观众对他的作品的反应,用生动准确的语言阐述了韦伯斯特的文学成就,追溯出历代对于英国文艺复兴时代诗剧的爱憎、迎拒的弧线,从中看出历代的风尚,并进而揭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一个侧面。这篇论文在其发表 28 年后的 1975 年由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出版社作为专著出版了单行本,成为该校编印的英国 17 世纪诗剧研究丛书之一。此书受到国外行家的一致好评。论者不仅对文章的内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且特别赞扬了王佐良把历来十分枯燥的考据内容写得生动感人的本领,说此书的文采“特别出色”,“它风格清新活泼,作者自始至终不失其幽默感,而且例举了许多有关所论时代的演出、研究和审美时尚的生动实例”。这种写作风格后来在他的其他文论中均有体现和发展。王佐良对韦伯斯特的文学声誉的研究赢得了自己在英国文学方面的声誉。

在英国留学期间,王佐良也从未间断诗文的创作。他用诗的语言记叙了乘船出国途经香港、新加坡、开罗等地的观感,这些颇富文采的游记,曾陆续发表在天津《大公报》上。

结束了在牛津大学的学业后,王佐良曾准备去法国继续深造,而这时的中国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毅然放弃了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机会,远涉重洋,于新中国诞生前夕的 1949 年 9 月回到了解放了的北平,回到了妻儿身边。他在 40 年后回忆这段经历时曾对记者说:“当时的留学生大多数都和我一样,急于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记得当时帝国主义对大陆实行封锁,从香港乘船到大陆有一定的风险,但即便是那样,我们也下决心要回来。说实

在的,当时要留在英国也不是不可以,而且生活也会很不错,但我们从未想过要留下,从留学一开始就认为回国是天经地义的。”回国后,王佐良全家一直居住在清华校园内。50年代,妻子徐序又生下二子。

在经过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的短期学习后,王佐良被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校(后改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即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在该校工作直到逝世。

建国之初,中共中央宣传部组建了《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王佐良与他的老师金岳霖、钱钟书等著名学者一起被聘为委员,共同参加了《毛泽东选集》1—4卷的英译工作。

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工作期间,王佐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英语教学中。由于他从中学起就经常受到英语环境的陶冶,在大学和出国留学期间更是受到多位中外名师的指导,他在英语教学中不仅展现了学识渊博的风貌,而且以较早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等现代先进教学方法而受到师生的欢迎。王佐良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历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英语系主任、副院长、顾问、学术委员会主任、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等重要职务,几十年来一直辛勤耕耘在外语教学战线上,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高质量的人材,其中有许多人已成为我国外交、外贸、外国文学研究与教学方面的骨干力量。在王佐良和他的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外国语学院很快便成为我国水平最高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基地之一,在国际上也享有越来越高的声誉。

根据教学和翻译工作的需要,王佐良潜心研究了英语语言学方面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英语文体和风格。他在1963年撰写了《关于英语的文体、风格研究》,在国内率先提出了开展这方面研究的建议,文中精辟地指出:“文体、风格的研究是有实际用途的,它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观察英语的性能,看到英语的长处、短处,以及我们在学习英语时应该特别注意或者警惕的地方。因为英语一方面不难使用,一方面却又在不小心或过分小心的使用者面前布

满了陷阱。”“对于英语教学来说,文体、风格之类最忌空谈,能否说出口语体、笔语体的名称或修辞格的意义,对于能否确切了解与恰当运用英语,没有多少关系。但是教师在教材的选择上却须具备有关文体、风格的知识,例如我们眼下的初年级教材着重选用能上口但又不过于口语化的文字,中、高年级需要有利于笔头模仿的各种实用文体(书信、布告、公文、特殊的报纸文体之类)以及一定数量的艺术文体。教师有一点文体、风格的研究显然可以选择得更自觉、更细致,自己编写起教材来也容易有意识地注意文体上的适合性。对于高年级的学生,对于处于提高阶段的学习者,文体、风格的训练能够帮助他掌握英语已如上述,但是这所谓掌握不仅是自己会说会写,还包含着对别人说的写的有确切的了解。真正确切地了解外语不是易事,造成了解困难的有许多因素,其中也有文体、风格的因素。”当时即使是在英语国家,对英语文体和风格的研究也是方兴未艾的课题,因此,王佐良的这篇论文堪称国内系统研究英语文体学的开山之作。在这前后,他还先后发表了一系列从语言学角度研究英语语言的论文,例如《现代英语的简练》(1957),《英语中的强调手段》(1964),《英语文体学研究及其它》(1978),《现代英语的多种功用》(1979)等。这些论文在1980年汇编成《英语文体学论文集》一书,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繁重的教学科研与行政工作使王佐良只能利用假期时间从事文学翻译,他谦虚地自称为“一个业余翻译者”。由于时间所限,除了在建国初期曾与友人方钜成、姜桂浓等合作由英文翻译出版了苏联作家爱伦堡的长篇小说《暴风雨》以外,他没有再译过大部头的小说,但翻译了为数可观的英语经典诗文和散文。50年代,他发表了培根的《随笔》译诗三篇,更为中国读者留下了苏格兰著名诗人彭斯的脍炙人口的诗句:

“呵,我的爱人像朵红红的玫瑰,

六月里迎风初开;

呵,我的爱人像支甜甜的曲子,

唱得合拍又柔和。”

(《彭斯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年版，1985年增补版)

1958年，王佐良与巴恩斯合作完成了中国话剧的经典作品——著名剧作家曹禺的《雷雨》全剧剧本的英译工作。他用生动、地道的英语准确地表现了剧中各角色的个性，出版后受到行家的一致赞赏。此外，他还将一些难度很大的汉语诗文翻译成英文。

由于王佐良在教学、科研和翻译工作中的杰出成就，使得他在60年代间先后被选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北京市文教系统的先进工作者，出席了全国文教系统的先进工作者大会。

在共和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动乱时期，同许多同时代的专家学者一样，王佐良自然难逃一劫。抗战期间的一段经历使他又一次蒙受“历史问题”的审查，尽管有关事实早已在建国初期就已经澄清了；他在英语界所处的位置更使他“理所当然”地被打成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先是抄家批斗，继而发配到“干校”接受教育。但即使在那个特定的时期，英语作为一种既可用于国际交流，亦可用于阶级斗争的工具，仍有其重要的使用价值。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北京外国语学院从1971年开始组织编写《汉英词典》。由于有了这个契机，仍在接受“审查”的王佐良有幸于1975年进入编写班子，并成为副主编之一（主编为吴景荣）。这本从中美关系解冻开始编纂，到“四人帮”覆灭后的1978年面世的大型工具书是王佐良一生参与编写的惟一一部辞书。编辞书并非是他的主要特长，但在“文革”时那样的特殊年代，能有这样的相当专业的工作任务当然是十分宝贵的。王佐良以满腔的热忱积极投入了这项工作。为了力求每一个词条、释言和例句都达到准确无误和鲜明生动，他废寝忘食、一丝不苟地进行了大量的查阅、考证工作，并尽力为参与编写工作的青年教师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在总结编写这部词典的心得体会时，他说：“最终决定一部作品语言的好坏，

以及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一部词典优劣的,不仅在于编著者对于某种表达形式的精通与否,而且还在于他对论及对象的敏感性、他的想像力、他的求知欲和对新事物探索的勇气、他对人类事业的关注和祂是否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实际上,这种不满足于就事论事的思维方法和勇于求索、善于想像和孜孜不倦的敬业精神,一直贯穿于王佐良的毕生。

王佐良及其同事们同心协力,使《汉英词典》以其丰富的内容、严谨的结构和准确的诠释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到1994年,商务印书馆已连续印刷15次,199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又出版了它的修订版。它的体例、词条和释义也为众多的后来者所广泛模仿和引用。

随着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重新走上正轨,王佐良的才华也得以尽情地发挥。1981年起,他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1985年任该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外国文学组组长。同时,他还历任国家教委高等院校专业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专业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顾问,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会长等职。由于他在英语教学方面的成就,还被清华大学等多所著名院校聘为特邀或兼职教授。

王佐良在英语文学方面的造诣使他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兼任研究员,并当选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和中国莎士比亚学会副会长。

作为诗人和翻译家的王佐良是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华文学基金会中美文学交流奖评委员会主任,北京市翻译者协会副会长。另外,他还是《外国文学》、《文苑》杂志的主编,并兼任《英语世界》、《英语学习》、《世界文学》、《译林》等多种杂志的编委或顾问。

尽管身兼如此之多的行政和学术职务,王佐良仍然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所热爱的英语教学工作。除了亲自指导一批又一批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外,他还在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的选编方面为我

国英语教学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早在1961年,他就为国家主管部门制定大学英语专业培养方案选定了中英必读和参考书目,而且这个书目至今仍十分有用。从1980年起,除了传统的英语教学主流课程之外,他又领导一批中青年教师开出了关于欧洲文化的一门用英语教授的专门课程,为学生广泛而又具体扼要地介绍了欧洲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艺术、哲学以及科学技术方面的基本事实,并与同一时期相关的中国文化现象进行了比较。1992年,由他和祝珏、李品伟、高厚堃共同主编,将讲授这门课程所积累的讲义、提纲等整理成英文的《欧洲文化入门》一书出版。此举得到全国各外语院校的欢迎和关注。这一尝试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王佐良关于“通过文化来学习语言,语言也会学得更好”和“文化知识和文化修养有助于人的性情、趣味、道德、价值标准等的提高,也就是人的素质的提高,这是当前教育界和全社会极须加强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的一贯主张。

王佐良在英语文体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大大充实了我国英语教材的内容。1987年出版的由他和丁往道主编的《英语文体学引论》立意新颖、论述精辟、结构严谨,受到教育界的一致好评,荣获国家教委第二届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优秀奖及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了学术界的繁荣。在经过多年的思考与实践以后,王佐良在英语文学、比较文学、文学史和文学翻译理论等多方面的学术思想也日益成熟,他的写作热情一发而不可收。从1978年起,几乎每年都有他的专著出版,而发表在各杂志上的短文和学术会议上的论文更是数量惊人。

王佐良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向中国的广大读者系统地介绍了英语文学的大量优秀著作,特别是诗作和散文。“文革”后,先是主编了《美国短篇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后来他又和李赋宁、周珏良、刘承沛合作,陆续选编了《英美文学活页文选》,并将其集录成《英国文学名著选注》,(商务印书馆,1983)。以后,他又翻

译和主编了《苏格兰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英国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并非舞文弄墨——英国散文名篇新选》(三联书店,1994)等。在这些著作中,王佐良一方面亲自翻译了许多英语名作,而且还为他选编的几乎每一篇作品都精心撰写了介绍和评述,使读者在欣赏异国诗文的音韵风采之余,还能了解到不少有关作者的身世和文化背景知识。

王佐良在文学翻译方面不仅拥有丰富的实践,而且还在翻译理论方面也颇有建树。他的翻译主张,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他的《翻译:思考与试笔》(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论新开端:文学与翻译研究集》(英文专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和《论诗的翻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等专著和许多论文中。他特别注重包括翻译作品在内的各种作品必须面向读者,一再强调“一部作品要靠读者来最后完成”。他谦虚地把自己的译作称为“试笔”,说“翻译者是一个永恒的学生”。他认为,翻译的理论不能永远只是津津乐道于前人总结的“信、达、雅”三个字上,而应有自己的见解和发展。他自己的主张是:“一、辩证地看——尽可能地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作总是顺译和直译的结合;二、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在诗歌翻译方面,他更有独到的见解。他提出不论是翻译外国诗歌或中国诗歌,不仅要在音韵和节奏等形式因素上接近原作,而且应忠实原作的风格和意境,“传达原诗的新鲜和气势”。他还特别强调,翻译中要注意处理好全文和细节之间的关系,并谈了自己的体会:“如果译者掌握了整个作品的意境、气氛和效果,他有时会发现某些细节并不直接促成总的效果,他就可以根据所译语言的特点作点变通。这样他就取得了一种新的自由,使他能振奋精神,敢于创新。他将感到文学翻译不是机械乏味的事,而是一种创造性努力。”王佐良正是以这种“创造性的努力”完成了许多优秀的翻译作品的。

从上大学时撰写有关英国诗人艾略特的研究论文和在牛津大学主修17世纪英国文学开始,50余年中,王佐良一直在英国文学